

先赋还是后致： 什么在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马永霞，张 雪

[摘要]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解锁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现有研究多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讨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缺少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先赋性、后致性因素的影响机制。基于全国20所高校本科生的调查数据，利用先赋后致理论模型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和后致性因素的高校培养、个人努力共同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先赋性因素。进一步，在后致性因素中，个人努力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校培养；在先赋性因素中，以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和学历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且通过高校层次和教育质量异质性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同时，家庭背景因素也通过个人努力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但中等收入家庭、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效应最大。基于此，提出了强化个人努力、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帮扶弱势群体和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就业能力；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

一、问题提出

就业是关系经济社会稳定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大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然而在现实中，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收稿日期] 2018-12-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顾客满意度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研究”(71473014)。

[作者简介] 马永霞(通讯作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电子邮箱地址：mayongxia@sina.com；张雪，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电子邮箱地址：rossets@163.com。

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也愈见严重。而解锁就业难的关键之一在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特别在当今越来越重视个人努力和能力的社会，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成为突围就业难困境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利剑”，其不仅决定着大学毕业生初职的取得，也影响着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大学生实现最初就业、维持工作和必要时获得新的工作的能力，^①其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也有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等后致性因素。先赋性因素是大学生就业能力获得的重要基础，相关研究发现了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受教育程度、社会政治地位等家庭背景因素的重要作用。例如，彭树宏(2014)发现家庭收入、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史秋衡和王芳(2018)发现我国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在性别、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差异。岳昌君(2018)指出城镇大学生在能力增值上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后致性因素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得以发展的关键，其中，高校培养的过程性因素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例如，宋齐明(2018)指出课程教学、课程支持和实习效果对大学生就业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程玮(2016)发现专业设置、职业规划、评价激励、校园文化、教学能力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汪昕宇(2014)发现个人参加校外兼职、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和有针对性的培训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有积极作用。鲍威(2016)发现大学生在课程学习和课外活动中的投入对就业能力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综合来看，学界从教育学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社会学角度对先赋性、后致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却较少被提及，虽然相关研究也有涉及某一种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有学者(史秋衡、王芳，2018)分析了个人先赋性因素、教育培养因素和个人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但没有明确界定先赋性、后致性因素，也没有分析两类因素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大学生就业能力主要是源于先赋性因素，还是更多地依靠后致性因素？后致性因素能否有效阻断或减轻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家庭背景、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为此，本研究将基于先赋后致理论模型，探究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作用，以期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提供实证依据。

^① Hillage, J., and E. Pollard, 1998, "Employability: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Policy Analysis", DfEE: 85.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模型

(一)理论基础

先赋后致理论源于美国社会学家 Blau 和 Duncan(1967)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他们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职业流动进行了系统考察,比较了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模型中包括两大类的五个核心变量:一类是先赋性因素(ascribed factor),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另一类是后致性因素(achieved factor),包括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和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它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为因变量,以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为先赋性因素,以本人受教育程度和初职地位为后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了因果关系模型,认为社会地位的获得同时受到先赋性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 2/3 左右可以由个人教育程度来解释,说明了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较先赋性因素而言在决定职业地位获得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的职业地位并无直接影响,而是间接通过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教育来发生影响。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儿子现职成就包含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间接影响是通过对儿子的教育和初职的影响来实现的。这一研究使人们意识到,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而教育导致了社会地位流动和再生产的双重结果。自此之后,家庭背景和教育作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最重要的代表,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证实。

多数学者认为毕业生初职地位的获得受到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地位流动呈现继承流动和竞争流动的双重特征(高玉玲,2014)。有学者认为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在个人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更大(袁红青、李荔波,2013;陈书伟、韩丽,2017);也有学者认为家庭背景的影响依然存在(文东茅,2005;岳昌君、杨中超,2012),主要涉及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和家庭背景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吴愈晓,2017)。研究者针对家庭背景之于教育获得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尽管有学者发现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关联有所下降(刘精明,2006),多数学者认为家庭背景维持了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王伟宜,2013),体现在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导致的教育质量的差异上(丁小浩,2006)。换言之,高等学校的层级越高,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越高,家庭出身的影响也越强(刘精明,2014)。由此,优势阶层子女获

取更多的上重点大学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梁晨等, 2012; 吴晓刚, 2016; 叶晓阳、丁延庆, 2015), 为获得较好的工作打下基础(李春玲, 2014)。也有研究者针对高等教育对初职获得的影响进行探究。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院校的办学质量、学术声誉及所拥有的资源等存在很大差异, 就读于不同院校的学生面临的职业前景不同(王伟宜, 2013), 以及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叶晓阳、丁延庆, 2015)。也有学者认为与个人能力和努力相关的教育因素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上升, 而无关系因素则下降(陈恢忠, 2005)。但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并没有促进地位上升, 而是扮演了地位再生产的角色, 个人教育资质与所获阶层地位的关联甚至逐渐变弱(Breen and Goldthorpe, 2001)。

相比毕业生初职获得而言, 从先赋后致的角度分析大学生能力获得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学业成绩和在校表现, 且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例如, 高耀等(2011)指出优越的家庭条件与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担任学生干部、获奖具有正向关系, 认为学校把家庭背景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乔志宏等(2014)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英语成绩更好, 也更有可能在学校担任学生干部, 但在入党方面, 父母职业层级越低、家庭收入越低的学生入党的可能性更大。权晓娟和边燕杰(2017)考察城乡背景对大学生在校表现的影响, 发现农村学生学习能力更强, 但组织协调和沟通表达能力与城市学生无显著差异。李梦竹(2018)发现出生贫寒的大学生, 在党员身份获得、奖学金获得、科研项目获得以及学习成绩上, 都要显著优于优势阶层大学生。熊静和余秀兰(2015)的研究表明在入学之初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总体学业能力存在显著差距,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二者差距逐渐缩小并变得不显著。而专门针对就业能力的研究更加稀少, 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 陈永杰(2011)发现就业能力强的学生毕业于重点院校, 而进入这些名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强势社会阶层的家庭。刘精明(2006)指出能力分化不仅由个人努力因素所决定, 先赋性条件、学校教育过程与教育制度都可能导致不同的能力结果。马道明(2015)发现家庭背景因素制约了农村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心理状态和职业能力。尽管上述研究呈现出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学校教育和个人努力等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学业表现、能力素质的影响, 但很少有从动态的视角把脉大学生入学之前、在学期间和毕业后的就业能力发展历程, 深入分析家庭背景、高等教育在不同阶段的影响, 先赋、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机制仍然处于一个“黑箱”状态。

总体来看, 学者们普遍认为家庭背景作为先赋性资源影响个人社会地位

的获得,而后致性因素的高等教育和个人努力也会对此产生影响。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背景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但家庭背景的影响依然存在,不仅影响最终结果的职业地位获得,而且影响中间过程的教育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经历和能力素质提升。就业能力是连接先赋性、后致性因素与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桥梁,既受到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和后致性的学校教育、个人努力的共同影响,又影响毕业生初职的获得。

本研究核心的研究问题是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具体包括:家庭背景是如何通过教育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经历和个人自身努力影响就业能力的?高等教育能否独立于家庭背景促进能力发展的“阶层流动”,还是维持了“原有阶层”能力的再生产?大学生个人努力能否打破家庭背景的限制而实现就业能力跃升?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是否意味着大学生能够摆脱家庭背景的限制,通过教育培养和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不同层次的院校的教育质量的差异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获得?

(二)研究模型

根据已有文献,我们发现仅仅考察先赋性和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是有局限的。家庭背景这一先赋性因素意味着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得到转化从而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不同层次类型院校的教育质量的异质性会进一步造成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差异,学生的个人努力也会受到家庭背景和高校培养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发挥个人能动性的潜能,可见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先赋性、后致性因素的影响过程和机制非常复杂。

本研究建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先赋性、后致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见图1)。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和后致性因素的高校培养、个人努力分别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从间接影响效应来看,家庭背景通过高校培养间接影响就业能力,家庭背景通过个人努力间接影响就业能力,高校培养通过个人努力间接影响就业能力。具体针对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背景通过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院校层次及教育质量影响就业能力。针对高校培养与大学生就业能力,院校层次与教育质量交互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即高校层次越高,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水平越高。

基于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₁: 先赋性因素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H_{1a}: 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H_{1b}: 父母职业阶层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H_{1c}: 父母学历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H₂: 后致性因素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H_{2a}: 高校培养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H_{2b}: 个人努力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H₃: 后致性因素比先赋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更大
 H_{3a}: 高校培养比家庭背景影响更大
 H_{3b}: 个人努力比家庭背景影响更大
 H₄: 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教育质量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H_{4a}: 家庭背景影响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院校层次
 H_{4b}: 院校层次影响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
 H_{4c}: 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影响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
 H_{4d}: 不同层次院校的教育质量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效果不同
 H₅: 家庭因素通过个人努力对大学生就业能力产生影响
 H_{5a}: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不同
 H_{5b}: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同
 H_{5c}: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效果不同
 H₆: 高校培养通过个人努力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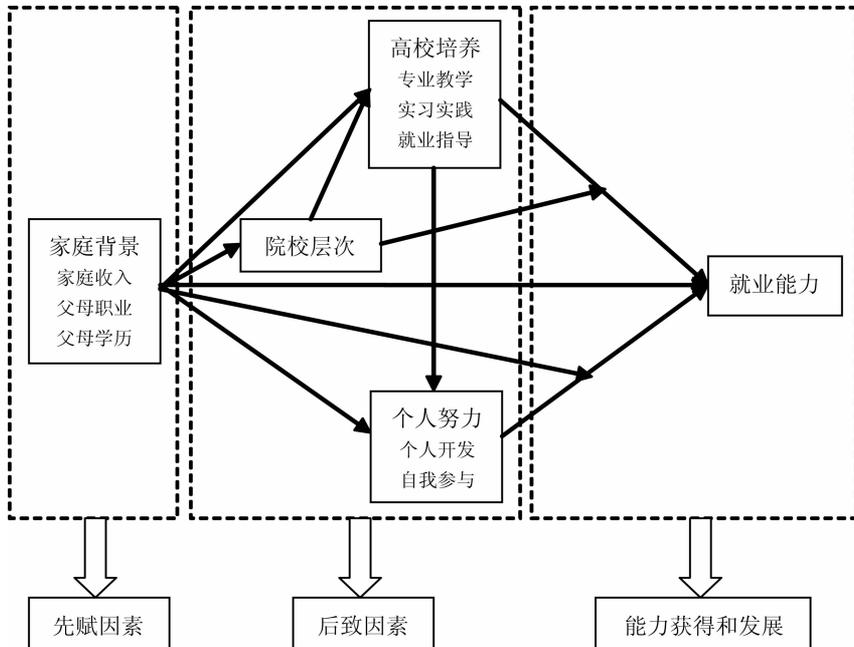


图 1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指标设计

1. 因变量

大学生就业能力采用课题组编制的就业能力六因素模型量表,分为个性品质、决策能力、人际能力、学习规划、通用技能、职业规划六个维度,共有25个题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按照“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分别记为1—5分。本研究将25个指标取均值处理,得到总体就业能力这一指标。

2. 自变量

(1)先赋性因素

先赋性因素是与生俱来或自然条件下获得的背景,主要是指家庭背景,具体包括家庭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分别以家庭人均月收入、父母职业阶层和父母受教育程度^①为代理变量。本研究将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低收入的小于4000元、中等收入的4000—7000元和高收入的大于7000元,以低收入为参照组。父母职业阶层分为行政管理人员,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办事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上层,个体工商户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工人构成的中层,底层以农民、农民工、无业、失业、半失业构成,以底层职业为参照组。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本科及以上、大专高中和初中以下,以初中以下为参照组。

(2)后致性因素

后致性因素是通过后天教育和努力可获得或改变的因素,在本研究中是指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高校培养借鉴程玮(2015)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量表,编制了包含25个题项的量表。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题项和维度,KMO值为0.973,Bartlett检验值的显著水平小于0.001,说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专业教学、实习实践、就业指导三个因子,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大于0.5,说明会聚效度很好。各维度的信度系数为0.929、0.933和0.943,说明信度很好。

个人努力由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两部分构成。个人开发采用汪昕宇(2014)的大学生个人就业能力开发量表,包括校外兼职实习、职业资格考试、业余学习培训共有3个题项。自我参与借鉴鲍威(2016)的就业能力自我参与

^① 本研究中的受教育程度与学历为同一含义,在此处的变量定义上使用受教育程度,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使用学历作为简化。

量表并根据大学生、教师访谈进行改编，包括积极投入专业学习、积极参加实习实践、创新创业、就业活动，共有4个题项。

上述变量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按照“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分别记为 1—5 分。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以女生为参照组；生源地即学生上大学之前的家庭所在地，分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农村，以乡镇农村为参照组；^① 高校层次分为 985 高校、211 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以普通本科高校为参照组；专业分为理工农医和经管文教，以经管文教为参照组；年级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和 大四，以大四为参照组。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理工大学“基于顾客满意度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课题组在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6 月对全国高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问卷主要包括大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所在院校信息、高校教育培养活动、个人开发活动、个人参与高校培养活动、就业能力情况等。选取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区，每个区选取 2—3 所高校，包括 985 高校、211 高校和普通高校，涵盖理科、工科、经管、医科等几乎所有学科门类，覆盖从大一到大四的各年级本科生。课题组成员在图书馆、教室、宿舍现场发放和回收。共发放问卷 2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50%，剔除关键变量遗漏回答，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1755 份，有效率为 87.75%。

(三)数据描述

如表 1 所示，大学生就业能力总体均值为 3.57，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先赋性因素中，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4000 元的占 42.3%，4000—7000 元占 32.7%，7000 元以上占 25.0%。父母职业层级为高层(含行政管理人员，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办事人员，各类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占 41.6%，中层(含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工人)占 33.7%，低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农民、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占 24.6%。父母受教育程度为本科以上占 26.3%，大专高中占 39.7%，初中及以下占 33.9%。后致性因素中，高校培养总体均值为 3.83，各维度从高到低为实习实践

^① 在本研究中生源地作为控制变量，实际上生源地也可以作为先赋性因素的一种表征，但本研究以最能反映学生先天条件的家庭背景因素作为先赋性因素。

(3.92)、就业指导(3.91)和专业教学(3.65)。个人努力总体均值为3.28,其中自我参与(3.07)高于个人开发(3.92)。控制变量中,生源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占21.0%,地县市占49.9%,乡镇农村占28.5%。院校层次,985高校占27.8%,211高校占26.5%,普通高校占45.2%。年级,大一占22.6%,大二占18.4%,大三占19.8%,大四占38.0%。专业,理工农医占42.5%,经管文教占56.3%。性别,男生占43.7%,女生占56.3%。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就业能力	非常低=1, 比较低=2, 一般=3, 比较高=4, 非常高=5	3.57	0.761	1755
专业教学		3.65	0.837	1755
实习实践	非常不符合=1, 比较不符合=2, 一般=3, 比较符合=4, 非常符合=5	3.92	0.824	1755
就业指导		3.91	0.804	1755
个人开发	非常不符合=1, 比较不符合=2, 一般=3, 比较符合=4, 非常符合=5	3.07	1.045	1755
自我参与		3.44	0.911	1755
多类别变量	变量定义	取值的百分比		
家庭月收入	分为低于4000元、4000—7000元、高于7000元	1: 低于4000元(42.3), 2: 4000—7000元(32.7), 3: 高于7000元(25.0)		
父母职业阶层	分为高层、中层和低层	1: 高层(41.6), 2: 中层(33.7), 3: 低层(24.6)		
父母教育程度	分为本科以上、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	1: 本科以上(26.3), 2: 大专高中(39.7), 3: 初中及以下(33.9)		
生源地	分为省会市、地县市、乡镇农村	1: 省会城市(21.0), 2: 地县市(49.9), 3: 乡镇农村(28.5)		
院校层次	分为985高校、211高校、普通本科	1: 985高校(27.8), 2: 211高校(26.5), 3: 普通本科高校(45.2)		
年级	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1: 大一(22.6); 2: 大二(18.4); 3: 大三(19.8); 4: 大四(38.0)		

续表

二分变量	变量定义	取值为 1 的百分比
专业	理工农医=1, 经管文史哲教=0	理工农医(42.5)
性别	男性=1, 女性=0	男(43.7)

四、结果与分析

(一)先赋性、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

采用层次回归和逐步回归分析法,表 2 的模型 1 为先赋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显著低于家庭人均月收入 7000 元以上的大学生 0.139($p < 0.001$)。父母从事高级阶层职业和父母从事中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分别比父母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显著高出 0.192($p < 0.01$)和 0.191($p < 0.001$)。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 0.092($p < 0.05$)。可以判断出家庭背景的高收入、高职业阶层和高学历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假设 H_{1a} 、 H_{1b} 得到了证明, H_{1c} 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模型 2、模型 3 为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进行回归,模型 2 为高校培养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回归,结果显示,专业教学($p < 0.001$)和就业指导($p < 0.001$)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实习实践影响不显著。模型 3 为个人努力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进行回归,个人开发($p < 0.001$)和自我参与($p < 0.001$)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可以看出,后致性因素的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从回归系数来看,个人努力的影响程度高于高校培养,其中自我参与($\beta = 0.245$)高于个人开发($\beta = 0.163$),就业指导($\beta = 0.158$)与专业教学($\beta = 0.156$)的影响程度相近。模型 4 和模型 5 是逐步回归,所得结果与模型 2、3 一致,说明模型较为稳定。假设 H_{2a} 和 H_{2b} 得到了证明。

为了进一步比较先赋、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程度,将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和控制变量纳入到一个线性回归方程中,模型 6 结果显示,在先赋性因素中,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低于家庭人均月收入 7000 元以上的大学生 0.123($p < 0.05$),父母从事高级阶层职业和父母从事中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分别显著高于父母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 0.117($p < 0.05$)和 0.151($p < 0.001$),但父母学历影

响不显著。在后致性因素中,个人开发($\beta=0.157, p<0.001$)、自我参与($\beta=0.152, p<0.001$)仍然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自我参与的回归系数较模型5有所下降。而高校培养中仅有就业指导($\beta=0.088, p<0.05$)正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且回归系数有所下降,其他维度影响不显著。整体来看,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大于先赋性因素,个人努力较高校培养更为重要,而先赋性因素仍然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因素。该结果验证了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假设 H_{3b} 得到了证明, H_{3a} 没有得到证明。后致性因素的回归系数下降说明可能存在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效应,需要进一步探究。

表2 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	3.576***	2.254***	2.176***	2.254***	2.195***	1.751***
男生	0.102**	0.132***	0.110**	0.127***	0.107**	0.120***
985 高校	0.035	-0.095*	0.065	-0.106*	0.052	-0.022
211 高校	-0.180***	-0.187***	-0.062	-0.202***	-0.077	-0.108**
理工农医	-0.148***	-0.198***	-0.110*	-0.166***	-0.087*	-0.103**
大一	-0.169**	-0.228***	-0.056	-0.232***	-0.069	-0.112**
大二	-0.291***	-0.285***	-0.181***	-0.277***	-0.182***	-0.192***
大三	-0.227***	-0.188***	-0.105*	-0.198***	-0.119*	-0.123**
直辖市省会市	0.085	0.207***	0.209***	0.082	0.096*	0.089
地县市	0.019	0.125**	0.141***	0.013	0.046	0.033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	-0.139**			-0.137**	-0.120**	-0.123**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7000	0.035			0.028	0.019	0.021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0.192**			0.145**	0.126*	0.117**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0.191***			0.165***	0.159***	0.151***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0.085			0.062	0.068	0.055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0.092*			0.081*	0.035	0.043
专业教学		0.156***		0.149***		0.056
实习实践		0.069		0.066		0.064
就业指导		0.158***		0.157***		0.088**
个人开发			0.163***		0.160***	0.157***
自我参与			0.245***		0.236***	0.152***

续表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调整后 R ²	0.101	0.204	0.271	0.227	0.287	0.316
R ²	0.109	0.210	0.276	0.235	0.295	0.324
F	13.714***	37.346***	58.472***	28.653***	41.254***	40.202***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N=1755

(二) 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教育质量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根据上述得出先赋性、后致性因素共同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结果，在此需要分析先赋性因素通过后致性因素影响就业能力的作用机制，即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通过学生接受教育质量的差异，最终导致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差异。

1. 家庭背景与院校层次

将家庭人均月收入、父母职业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与高校层次进行交叉列联统计描述，如表 3 所示，家庭经济条件好、父母社会地位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学生进入优势高校，即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多来自优势阶层家庭，而普通本科的生源构成则多来自弱势家庭。这与入学机会平等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弱势家庭的子女虽然有会考上大学了，但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却减少了。换言之，在国家重点院校里，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了较大的份额，而在资源缺乏、教育质量较弱的地方院校中，则聚集了最多弱势家庭的学生。假设 H_{4a} 得到了证明。

表 3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进入不同层次高校的差异

变量	水平	985 高校 (%)	211 高校 (%)	普通本科 (%)
家庭人均月收入	高	30.7	26.2	20.9
	中	35.3	33.4	30.0
	低	34.0	40.4	49.1
父母职业阶层	高	48.4	44.4	35.8
	中	27.2	32.8	38.2
	低	24.5	22.8	26.0
父母教育程度	高	36.3	28.5	18.9
	中	37.1	40.0	41.8
	低	26.6	32.0	39.4

2. 院校层次与教育质量

由于不同层次院校的办学质量、学术声誉及所拥有的资源存在很大差异,就读于不同院校的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也有所不同。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如表4所示,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在专业教学、实习实践、就业指导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01$ 。通过LSD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985高校的教育质量显著高于211高校和普通高校,211高校显著高于普通高校,证实了重点高校的教育质量普遍高于普通高校。换言之,重点高校的大学生享受优质的教学资源、实践体验和职业规划。假设 H_{4b} 得到了证明。可以推断,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接受教育质量不同,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即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进一步影响教育质量。假设 H_{4c} 得到了证明。

表4 不同层次高校的教育质量的差异

变量	高校层次	样本量	均值	F	p-value
专业教学	985 高校	487	3.96	54.818	0.000
	211 高校	464	3.61		
	普通高校	792	3.48		
实习实践	985 高校	487	4.21	54.954	0.000
	211 高校	464	3.94		
	普通高校	792	3.73		
就业指导	985 高校	487	4.15	35.993	0.000
	211 高校	464	3.89		
	普通高校	792	3.77		

3. 家庭背景、院校层次、教育质量与就业能力

为检验不同层次高校的教育质量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构造高校层次与教育质量的交互项,表5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是没有控制先赋性因素的情况,结果显示专业教学、实习实践和就业指导分别正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而且专业教学、就业指导分别与985院校的交互项正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说明985高校的专业教学、就业指导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较大,即重点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较强。假设 H_{4d} 得到了证明。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是在控制先赋性因素的情况下,得出专业教学、实习实践和就业指导分别正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但仅有专业教学与985院校交互项显著影响就业能力,且其系数比模型1结果小,实习实践、就业指导与院校交互项不显著。与模型1—3相比,先赋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高校培养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说明家庭背景因素在学生进入高校后继续发挥潜在的作用，显著影响着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

表5 家庭背景、高校培养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	2.607***	2.567***	2.443***	2.519***	2.471***	2.352***
男生	0.116**	0.136***	0.128***	0.114**	0.132***	0.125***
985 高校	-0.078	-0.069	-0.068	-0.105*	-0.097*	-0.096**
211 高校	-0.145**	-0.178***	-0.166***	-0.180***	-0.216***	-0.204***
理工农医	-0.204***	-0.227***	-0.219***	-0.150***	-0.169***	-0.163***
大一	-0.263***	-0.207***	-0.192***	-0.270***	-0.216***	-0.201***
大二	-0.296***	-0.280***	-0.248***	-0.297***	-0.284***	-0.253***
大三	-0.186***	-0.218***	-0.169**	-0.206***	-0.236***	-0.189***
直辖市省会市				0.065	0.098	0.094
地县市				0.016	0.009	0.006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				-0.133**	-0.140**	-0.131***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7000 元				0.025	0.023	0.036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0.152**	0.152**	0.152**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0.170***	0.162***	0.167***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0.068	0.059	0.064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0.077	0.095	0.079
专业教学	0.328***			0.313***		
实习实践		0.317***			0.305***	
就业指导			0.343***			0.329***
985 高校 * 专业教学	0.047*			0.038*		
211 高校 * 专业教学	-0.003			-0.002		
985 高校 * 实习实践		0.026			0.016	
211 高校 * 实习实践		-0.005			-0.004	
985 高校 * 就业指导			0.039*			0.026
211 高校 * 就业指导			-0.026			-0.027
调整后 R ²	0.180	0.167	0.182	0.209	0.200	0.214
R ²	0.185	0.172	0.187	0.218	0.209	0.223
F	38.194***	34.941***	38.857***	25.976***	24.585***	26.735***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N=1755

(三) 家庭背景通过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在此需要分析家庭背景通过大学生个人努力影响就业能力的作用机制，即家庭背景与个人努力交互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1. 家庭背景与个人努力

采用单因素方差法比较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个人努力方面的差异，如表6所示，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在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方面高于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的大学生在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方面显著高于父母学历为本科以上和父母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大学生。父母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在个人开发方面显著高于父母从事中级阶层职业和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在自我参与方面显著高于父母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具有中等学历、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较高，特别是在自我参与方面，说明家庭背景较好的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和实践活动。假设 H_{5a} 得到了证明。

表6 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的差异

变量	水平	个人开发			自我参与		
		均值	F	p-value	均值	F	p-value
家庭人均 月收入	低	2.99			3.37		
	中	3.14	3.442	0.05	3.55	6.348	0.01
	高	3.10			3.42		
父母职业阶层	低	2.92			3.32		
	中	3.09	6.145	0.01	3.42	7.788	0.000
	高	3.14			3.53		
父母教育程度	低	2.94			3.33		
	中	3.17	7.907	0.000	3.54	8.056	0.000
	高	3.08			3.45		

2. 家庭背景与就业能力

采用单因素方差法比较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差异，如表7所示，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略高于高收入家庭大学生。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大学生，略高于父母学历为本科以上大学生。父母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高于父母从事中级、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具有中等学历，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

学生就业能力较高，说明家庭背景较好的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支出了费用，投入了精力，并以其社会交往潜移默化影响子女的就业能力。假设 H_{5b} 得到了证明。

表 7 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的差异

变量	水平	就业能力		
		均值	F	p-value
家庭人均月收入	低	3.41	28.246	0.000
	中	3.70		
	高	3.66		
父母职业阶层	低	3.33	30.641	0.000
	中	3.61		
	高	3.68		
父母教育程度	低	3.42	18.913	0.000
	中	3.64		
	高	3.66		

3. 家庭背景、个人努力与就业能力

为检验不同家庭背景下的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构造家庭背景与个人开发、家庭背景与自我参与的交互项，如表 8 的模型 3 和模型 4 所示，个人开发、自我参与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且个人开发、自我参与分别与家庭中等收入的交互项正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说明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成效较高。但个人开发、自我参与与父母高学历的交互项分别负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说明相比低学历家庭的大学生，高学历家庭的大学生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成效较低。自我参与与父母中等职业交互项负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说明相比父母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父母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通过自我参与方式提升就业能力的成效较低。总的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更加依靠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假设 H_{5c} 得到了证明。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家庭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较强，就业能力也较好，即家庭背景通过个人努力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但本研究也发现，父母中等学历、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较强，就业能力也较好，但其作用效果不如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他们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效应更大。

表 8 家庭背景、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	3.576***	2.195***	3.455***	3.548***
男生	0.102**	0.107**	0.104**	0.120***
985 高校	0.035	0.052	0.101*	0.018
211 高校	-0.180***	-0.077	-0.059	-0.125**
理工农医	-0.148***	-0.087*	-0.061	-0.125**
大一	-0.169**	-0.069	-0.029	-0.123**
大二	-0.291***	-0.182***	-0.173***	-0.195***
大三	-0.227***	-0.119*	-0.109*	-0.156**
直辖市省会市	0.085	0.096*	0.062	0.125**
地县市	0.019	0.046	0.023	0.055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	-0.139**	-0.120**	-0.119**	-0.125**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7000 元	0.035	0.019	0.030	0.003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0.192**	0.126*	0.149**	0.101**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0.191***	0.159***	0.175***	0.155**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0.085	0.068	0.067	0.095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0.092*	0.035	0.047	0.049
个人开发		0.160***	0.311***	
自我参与		0.236***		0.314***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 * 个人开发			0.024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7000 元 * 个人开发			0.052**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 个人开发			0.022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 个人开发			-0.006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 个人开发			-0.062**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 个人开发			-0.034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 * 自我参与				0.017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7000 元 * 自我参与				0.043**

续表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 自我参与				-0.022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 自我参与				-0.044**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 自我参与				-0.053**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 自我参与				-0.001
调整后 R ²	0.101	0.287	0.243	0.268
R ²	0.109	0.295	0.253	0.277
F	13.714***	41.254***	25.824***	29.235***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N = 1755$

(四) 高校培养通过大学生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将高校培养对个人努力进行回归，表 9 的模型 5 代表高校培养对个人开发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专业教学和实习实践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回归系数分别为 0.288 和 0.167， $p < 0.001$ 。模型 6 为高校培养对自我参与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专业教学和实习实践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回归系数分别为 0.314 和 0.278， $p < 0.001$ 。结合模型 3 和模型 4，当高校培养与个人开发、自我参与同时对就业能力进行回归时，专业教学、就业指导回归系数降低，但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仍然显著，即高校培养通过个人努力对大学生就业能力产生影响。假设 H_6 得到了证明。

表 9 高校培养、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回归

自变量	就业能力				个人努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数	3.576***	2.254***	1.811***	1.929***	1.966***	1.284***
男生	0.102**	0.127***	0.118***	0.125***	0.038	0.006
985 高校	0.035	-0.106*	-0.023	-0.063	-0.368***	-0.171**
211 高校	-0.180***	-0.202***	-0.110*	-0.153***	-0.413***	-0.197***
理工农医	-0.148***	-0.166***	-0.093*	-0.146***	-0.324***	-0.077
大一	-0.169**	-0.232***	-0.110*	-0.173***	-0.540***	-0.234***
大二	-0.291***	-0.277***	-0.197***	-0.228***	-0.356***	-0.193***

续表

自变量	就业能力			个人努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大三	-0.227***	-0.198***	-0.120*	-0.164***	-0.349***	-0.138**
直辖市省会市	0.085	0.082	0.066	0.112*	0.069	-0.119**
地县市	0.019	0.013	0.019	0.040	-0.026	-0.106**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元以下	-0.139**	-0.137**	-0.122**	-0.130**	-0.066	-0.027
家庭人均月收入 4000—7000元	0.035	0.028	0.032	0.013	-0.015	0.061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0.192**	0.145**	0.133**	0.113*	0.054	0.128**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0.191***	0.165***	0.154***	0.154***	0.048	0.043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0.085	0.062	0.046	0.070	0.073	-0.030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0.092*	0.081*	0.051	0.052	0.133*	0.116**
专业教学		0.149***	0.084**	0.069*	0.288***	0.314***
实习实践		0.066	0.071*	0.057	-0.024	0.035
就业指导		0.157***	0.119**	0.087*	0.167***	0.278***
个人开发			0.225***			
自我参与				0.252***		
调整后 R ²	0.101	0.227	0.300	0.291	0.228	0.291
R ²	0.109	0.235	0.308	0.299	0.237	0.219
F	13.714***	28.653***	39.242***	37.671***	28.912***	39.731***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N=1755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先赋后致理论模型，基于全国20所高校本科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机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大学生就业能力受到先赋、后致性因素共同影响，后致性因素影响更大

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是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处于优势，因为优势家庭的子女的起点高，他们享受丰富的教育资源，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所培养的能力素质不仅整体较高，而且表现出与高校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相契合。

后致性因素的个人努力是促进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作用不仅强于高校教育的影响，更是超越家庭背景的制约，显示出个人奋斗、自立自强的力量。高等教育也是促进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能力为导向的选拔机制和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活动为大学生创造了能力发展乃至向上流动的新机遇。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总体上决定了大学生能够通过高等教育和自身努力实现能力的提升，表明了高等教育所承载的个人梦想和社会期待仍能实现。

2. 家庭背景通过不同层次高校教育质量的异质性导致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

家庭背景是无法改变的限制性因素，使优势家庭的大学生拥有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高于弱势家庭的大学生。而高等教育出现分化，以“985工程”高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教育质量普遍较高，使得优势家庭的大学生接受较高质量的教育，进而他们获得的就业能力较高。对于弱势家庭的子女，早期教育资源的弱势使他们输在起跑线，即使他们当中有个别能考上大学，也少有机会上好大学，接受优质的教育，这使他们与优势家庭的子女有较大差距。这一过程体现了教育不平等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教育会以直接排斥或隐性排斥的方式将部分群体排除在升学和择校的竞争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能力无能”现象。高等教育促进了弱势家庭的子女通过能力跃升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这种能力优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3. 个人努力突破家庭背景限制实现就业能力跃升，但家庭背景影响依然存在

个人努力克服了家庭背景的劣势，实现了个人能力的提升，又同时又受制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单独从努力程度和就业能力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中等学历、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更加努力，其就业能力也较强。但从努力效果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依靠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成效较高。这说明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弱势大学生个人学习发展的机会，但也激发了他们自我奋斗的意识 and 改变

命运的内驱力。他们在学习上态度认真,踏实勤勉,实现了对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赶超。一方面,他们通过校外兼职实习实现就业能力的增殖,通过担任学生干部、入党、考证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背景的劣势。但是另一方面,家庭背景的隐性影响仍然存在,不仅赋予了大学生个人培养就业能力的资源条件,而且通过家庭教育、社会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

(二)对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论从先赋性、后致性因素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依据,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强化个人努力,倡导自我奋斗

个人努力是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也是减轻家庭背景影响的传递的重要途径。为此,大学生应树立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奋斗精神,主动挖掘个人的吃苦耐劳、踏实认真等优势,找到个体能力提升的潜在增长点。还应基于自发性的意愿,投入课堂学习,参加实践活动、参与兼职实习、考取资格证书,实现个人的综合发展。高校教师和辅导员应鼓励全体学生依靠自身努力成长成才,激发弱势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内驱力,独立自主的意识和改变命运的勇气。

2. 提高办学质量,促进资源共享

高校培养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层次高校的教育质量存在异质性。相比优势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校,多数弱势阶层的子女进入普通高校。而重点高校的教育质量高于普通高校,造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大学生就业能力上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应实施严格竞争考试制度,采取某些手段扶助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从而控制和弱化考试竞争所导致的阶层教育机会差异。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财政补贴以提高办学质量,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改善弱势阶层子女的就学环境,使学生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可借助“互联网+”技术推进名师课堂等网络课堂建设和应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3. 帮扶弱势群体,弥补先赋劣势

家庭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不仅直接影响,而且通过高等教育实现能力的再生产。尽管先赋性因素父母的教育背景、社会阶层和家庭收入是既定的,但父母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加强亲子互动,强化父母期望等方式弥补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不足。高校应加强对出身弱势家庭的大学生的关注,引导他们调整心态,积极融入大学生活,鼓励他们通过参加学生社团、担任

学生干部等途径弥补个人能力的先天劣势，并且给予一些保障性和发展性的资助支持，帮助弱势大学生提高就业能力，从而控制和弱化因阶层导致的能力差异。

4. 践行教育公平，起点过程并重

教育公平不仅要追求教育的起点公平、更要关注教育的过程公平。优势家庭的大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比例高于弱势家庭的大学生，而重点高校的教育质量普遍较高，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较高，说明了先赋性因素的潜在的影响。为此，国家应继续实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增加对弱势家庭大学生的教育倾斜，改善他们的就学环境和条件。高校也应推出招录农村优秀学生的专项优惠政策，提高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化程度，并完善就学就业资助服务体系，加强对弱势学生就业指导，帮助弱势大学生提高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 鲍威、刘薇，2016：《高校毕业生可就业能力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第36期。
- 程玮，2017：《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其提升实证研究——基于全国64所高校的有效样本分析》，《高教探索》第7期。
- 陈恢忠，2005：《市场过渡期中国大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致中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管理世界》第1期。
- 陈书伟、韩丽，2017：《青藏地区世居少数民族就业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27名世居少数民族成员的调查》，《统计与信息论坛》第8期。
- 陈晓宇、陈良焜、夏晨，2003：《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期。
- 陈永杰，2011：《大学生就业能力与社会不流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高耀、刘志民、方鹏，2011：《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学业表现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20所高校的调研数据》，《高教探索》第1期。
- 高玉玲，2014：《高校毕业生初职获得：基于地位获得模型的经验分析》，《教育与经济》第5期。
- 李春玲，2014：《“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梦竹，2018：《阶层背景对大学生在校表现及毕业去向的影响研究》，《当代教育科学》第6期。
-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 2012:《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刘精明, 2006:《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第3期。
- 刘精明, 2014:《能力与出身: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马道明, 2015:《农村大学生的城市之路》,《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 彭树宏, 2014:《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教育学术月刊》第6期。
- 乔志宏、苏迪、占诗苑、毕建传, 2014:《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就业去向和结果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 权小娟、边燕杰, 2017:《城乡大学生在校表现比较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 史秋衡、王芳, 2018:《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结构问题及要素调适》,《教育研究》第4期。
- 宋齐明, 2017:《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本科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第23期。
- 汪昕宇, 2014:《就业结构性失衡下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评估与开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王伟宜, 2013:《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高等教育研究》第12期。
- 文东茅, 2005:《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7期。
- 吴晓刚, 2009:《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社会》第5期。
- 吴晓刚, 2016:《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社会》第3期。
- 熊静、余秀兰, 2015:《研究型大学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学习经历差异分析》,《高等教育研究》第2期。
- 袁红清、李荔波, 2013:《农村大学生就业质量分析——基于浙江省1514名农村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第11期。
- 岳昌君、杨中超, 2012:《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高等教育研究》第4期。
- 岳昌君, 2018:《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城乡差异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2期。
- Blau, P. M. and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 Breen, R. and J. H. Goldthorpe, 2001, "Class, Mobility and Merit: The Experience of Two British Birth Cohort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 (2): 81—101.

Ascribed or Achieved Factor: What Affects Undergraduates' Employability?

MA Yong-xia, Zhang Xue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of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all communities, and the key to unlocking this problem is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Some researches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there is lack of the ascribed and achieved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Based on the undergraduate survey data of 20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y using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scribed and the achieved factors affect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chieved factors is greater than the ascribed factors. Among the achieved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effor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the ascribed factors, the background factor reflected by family income, parents' professional class and education level,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employability through the level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ckground factors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personal efforts, and the students with middle-income family, with low educated and low professional status parents have the greatest effect of relying on personal efforts to improve employability. Finally, it's suggested that strengthen individual efforts, improv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help the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equity.

Key words: undergraduates; employability; ascribed factor; achieved factor

(责任编辑：孟大虎 责任校对：孟大虎 孙志军)